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北京联合大学



HAIWAI ZHONGGUOXUE YANJIU (DIYIJI)

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

主编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韩强 梁怡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海外中国学研究

【第一辑】

HAIWAI ZHONGGUOXUE YANJIU (DIVIJI)

主编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

韩强 梁怡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再研究，也是对海外学者日益关注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本书兼顾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两大部分，其中海外中国学研究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则代表着海外中国学的时代理念和精神。在海外中国学的相关栏目中，强调对其历史与进程、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海外中国共产党相关的栏目中，则侧重对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建的研究。此外，本书还重点推出专家访谈栏目，以期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深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

责任编辑：张筱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外中国学研究 (第一辑) / 韩强, 梁怡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30-2483-9

I. ①海… II. ①韩… ②梁…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议—研究 IV. ①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536 号

海外中国学研究 (第一辑)

HAIWAI ZHONGGUOXUE YANJIU (DIYIJI)

韩 强 梁 怡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4 / 8102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80

责编邮箱：baina319@163.com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8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26 千字

定 价：56.00 元

ISBN 978-7-5130-2483-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卷首语

《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就要出版了，这是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提出的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力举措，也是北京联合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培育研究特色、推进学术立校的重要步骤。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对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再研究，也是对海外学者日益关注的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已经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研究视角、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乃至具体结论都对现实中国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具有启发意义，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也具有借鉴价值。但是，现实地看，海外中国学研究脱胎于海外汉学研究，其历史还不够长，知识积累有待进一步丰富，整个学科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仍任重道远。

基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学术价值与现实作用的认同，也考虑到自身研究的特色和优势，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自2012年6月成立伊始，就致力于跟踪和评述海外学界对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的进展情况，尤以海外中国共产党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即以海外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情况为对象，致力于挖掘研究的现实价值，着眼于中共党史和中共党建两大研究领域，兼顾国外对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和现实问题、对北京及都城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开阔研究的视野，启发研究的思路，为解决国内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话语权，进一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国际形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本专辑中，我们兼顾海外中国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两大部分，其中海外中国学研究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则反映着海外中国学的时代理念和前沿。为此，我们在海外中国学的相关栏目中，强调对其历史与进程、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在“海外中国共产党”栏目中，则侧重对国外研究中共党史党建的分析。此外，考虑到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我们适时推出“专家访谈”栏目，以期在中外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中深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

识。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我们也会注重相关资料的积累，包括对相关的海外学者和近期研究的篇目进行介绍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面临中外两种话语体系转换问题，因此在表述中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或不便，我们所选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特此说明。

我们深知，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通过开展研究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海外学界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历史和现实一系列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从而对我国的发展起到重要借鉴作用，也有助于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面对这样重大的使命，加强和深化海外中国学研究，尤其对海外中国共产党等问题进行专门化的研究，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我们编写出版《海外中国学研究》（第一辑）仅仅是我们在这一个领域研究中迈出的一小步，也期待着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把海外中国学研究做大做强，履行好理论工作者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社会服务等使命，为推进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编者

2013年10月

在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 徐永利

各位领导、专家，朋友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代表学校党委向各位与会领导、专家、代表和一直关心、支持我校发展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下面就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校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很有意义，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正所谓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

关于“天时”。从大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经济 30 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迅速扩大，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无论政界、学界和商界都有大批人士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研究队伍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大批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海外中国学已成当代“显学”。就国内而言，学术界对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再研究这些年发展也很快，国内也有不少专门机构，但总体上相对于这种发展势头而言还是有些滞后，在这种形势下，各高等院校积极加入进来，把相关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促进海内外研究的交流和互动，就显得十分必要。第二个“天时”就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2011 年 11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等文件，对如何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进行了全面规划部署，文件中明确强调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文件认为，要“推进高等学校与国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机构开展深入稳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鼓励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探索合作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面向海外学者设立中国问题研究专项，鼓励高等学校吸引海外学者参与研究项目，推进海外中国学研究”。我想，这就是天时，这就是发展机遇。我们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就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就是要抓住这个发展机会。

关于“地利”。主要指在我们北京联合大学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条件业已具备。“地利”也有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去年我校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龙头，这是我校第一次把学科建设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十二五”规划明确要大力加强我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建设，明确要加

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类基地和平台建设，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这一平台，学校也将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力度。二是在北京联合大学成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基础，或者说有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我们在国外党史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等方面有着较好的研究基础。中心现在拥有两个直接相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个还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的重大课题，还有一些其他类别的课题。比如梁怡教授已经完成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评析”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专著获得了200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中外关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比较研究”学术创新团队和海外中国学学术团队，这方面的成果也积累了不少。第三个意思是，我校有多个与海外中国学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平台或机构。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北京学研究所、政治文明研究中心等多个北京市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台湾研究院今年也将申请这一基地。文理学院历史系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研究。台湾问题、专门史等方向已经招收多届硕士生。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也正在申请硕士点。这些机构完全可以围绕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形成合力。虽然在外界看来，我校是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但是这些年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比较鲜明的特色。

关于“人和”。“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一支有团结协作和奋斗精神的队伍，一切都是空谈。在这里，“人和”也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人和”因素是校领导班子重视。我们学校领导班子对于建立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十分重视。成立这一中心是学校党政基于我校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各项宗旨所作出的决定，是经过我们反复酝酿的结果。这个我不多说。第二个“人和”因素是我们正逐渐形成一支研究海外中国问题的研究队伍，不乏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如梁怡教授在国外中共党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目前她已有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韩强教授是我们引进的人才，科研能力很强，在党的建设、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方面有很强优势，他有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一个是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他还有一批中央部委的委托项目。最近他就完成了一个中组部委托的关于海外党建研究的专项。除了他们以外，我们还有一批年轻博士，他们都有相关专业的研究背景，学缘结构合理，研究能力强，都有参与或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的经历。第三个“人和”因素是，在以往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与诸多国内外单位和一些知名学者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成为我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其中既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编译局以及与本学科相关的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在座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也是我们海外中国学研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校还将在今后的人才引进以及招聘方面，加大对海外中国学的支持力度，相信这支队伍在不久的将来会为大家贡

献出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对于这个中心以后的工作，我想提几点意见。

一、要对中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很广，可以做的题目很多，但限于我们刚起步，很多条件还不很成熟，因此不要遍地开花、面面俱到，而是要在我们的现有研究和优势的基础上逐步扩大研究领域，比如开展海外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等。正所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争取在某些方面或某一个点上出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先在学术界站住脚，然后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二、要在工作中探索出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要设法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组织起各路科研人员，尽可能对于海外中国学领域内某些热点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讨。可以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来中心进行交流访学；可以以课题为导向，以学者互访、科研信息交换、学术资源共享等形式进行开放式的研究；研究成果以丛书或集刊的形式予以出版；充分发挥好专职和兼职研究员两部分人员的优势，使之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彼此受益；要对中心的战略目标、近期研究方向和重点内容、管理制度进行专题讨论等。总之，通过科学的工作机制，使我们成为有一定实力、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和咨询机构。

三、要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为突破口，推动我们的学科建设。要着眼于我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相结合，注重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经验，不断完善我们现有的学科体系。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内，能使我们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提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基地，这样我们就有更好的研究平台，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四、要“学以致用”。北京联合大学的校训是“学以致用”，我想借用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上也是适用的。我们的学术成果不能停留在纸面上、报告中，也要想方设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一要尽可能多地把国外对中国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译介到中国，也把中国的研究成果及时推到国外去，这也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需要。二要在我们的对外学术交流中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三要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重要支撑。四是我们的研究还要为政府工作提供理论咨询，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和思想支持。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各位参会的代表，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年轻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扶上马，送一程”，并在今后的道路上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携手共进、协同创新，共同推进海外中国学的繁荣。

谢谢大家！

开辟视野，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 徐维凡

尊敬的各位老前辈、老专家、各位领导、各位老师，非常高兴参加北京联合大学举办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和学术研讨会。

今天，我感到非常地受鼓舞，因为据我不完全了解，今天参加成立大会的有这么多国内研究党史、党建和中国文化的的老专家、老前辈，他们德高望重、学养非常深厚，能够参加这个成立大会，我们北京联合大学非常高兴和欢迎。而从教育部社科司的角度看，这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等方面，意义都非常重大。所以，我借此机会对中心的成立和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也借此机会向各位老前辈老专家表示诚挚的问候！

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是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乃至全国各界都在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这样一个新形势下成立的。贯彻十六大精神，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还有推动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这些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应该有多方面的任务，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在更广义的中国当代的国情、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我们有很多的研究机构，也在持续不断地推出成果，这些都非常有力地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在各方面对中国当代实践的研究当中，大家越来越感到中国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那么，研究中国的道路、中国的经验，我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也要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北京联合大学成立这个中心就是开辟了一个新视野，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当然我这方面了解得非常肤浅，这不能说我们是首创，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但是即使是这样，我想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北京联合大学能够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既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也有助于加强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让国外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经验能够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参照，这也有助于我们开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开展我们各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所以，海外中国学研究这个视角、

这个领域确定得非常好，在这个领域通过我们的努力应该会取得非常大的研究成果。

北京联合大学把这个问题抓准了，决定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我感到这还是有非常大的气魄和勇气的，它需要积聚相当一批力量，然后向国内同行也包括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中向国外展示我们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个首先得益于国内有关方面的专家、领导对这方面的关心、支持和我们学校、党委、行政对于这项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努力。另外，我们的中心成立具备一定的基础和底气，即有梁怡教授为代表的首席专家研究团队，而且从社科司的角度看，我们对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科部最近几年来的情况了解的相对多一点，几次听到梁老师、韩主任介绍我们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一些想法。梁老师在介绍有关情况的过程当中，给我非常深的印象，她和她的研究团队对海外中国学这个问题看得很准，而且有一种矢志不渝、锲而不舍的精神。看准了问题而且也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中心成立起来，而且一定要办得好。因此，在这么多优势条件下研究中心的成立成为必然。

所以，我想借此机会，一来对我们研究中心的成立和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再有也是特别盼望我们的研究中心自成立开始，能够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把我们的研究方向更进一步地凝练好，把我们的研究队伍更进一步地汇聚好，把我们的平台更进一步地搭建好，以便能够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为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高校理论工作更好地服务。同时，也为提高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作出更多的贡献。

最后借此机会向各位老前辈、老专家表示中秋节的问候，谢谢大家！

贺 信

尊敬的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尊敬的梁怡教授：

欣闻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在此我谨致以衷心的祝贺。

自从利玛窦时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渐频繁，中国学的研究在西方国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德国也是如此，这无疑有助于欧亚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以及相互尊重。

17世纪德国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的兴趣，并十分推崇和赞赏；而20世纪中国著名的学术泰斗陈寅恪、季羡林等也曾远赴德国学习失传已久的古代西域文字的解读方法，这也是两国学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祖父约翰·拉贝作为“德中两国友谊的最好代表”（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芮悟峰博士2006年在拉贝故居落成仪式上的讲话），他也以其对旧中国和老北京风土人情的忠实记录，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誉。

“二战”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海外中国学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今天，我个人被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聘为外籍客座教授，这也是我个人的荣幸。在此，我谨表示我的谢意，并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致以由衷的祝贺！

致以友好的问候！

约翰·拉贝交流中心主席 托马斯·拉贝（Thomas Rabe）博士/教授

2012年9月20日，于德国海德堡

尊敬的韩强主任、梁怡教授：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在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学术领域中最值得欢迎的进展。我们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希望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可以增进我们人民之间的友谊！再次祝贺贵中心的成立！

美国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其韬（Thomas D. Lutze）教授

2012年9月22日，于美国布卢明顿

目 录

卷首语	I
在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徐永利/1
开辟视野,加强海外中国学研究	/徐维凡/4
贺 信	6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进程

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以对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为例	/张注洪/2
打开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与互动的一扇窗口	/章百家/10
“请进来”与“走出去” ——关于中国价值理念国际传播的几点思考	/武 力/15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几点认识	/魏海生/21
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归属	/何培忠/24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李雪涛/27
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李向前/37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如何交流的思考	/萧延中/41
海外中国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柳建辉/43
学术全球化趋势下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梁 怡/46
准确定位,做好海外中国学研究	/周穗明/50
挑战与机遇并存——浅说近年来的海外当代中国学研究	/王爱云/55

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	/梁 怡、刘晓云/60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马小芳、梁 怡/78
胡乔木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马贵凡/93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中共党建研究及评价	/韩 强/96
苏联和俄罗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陈 鹤/107
西方学者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王爱云/128
日本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乔 君/146
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取向论析	/韦 磊/156
中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观点对比	/靳书君/164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比较研究	/周文华/174
德里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后社会主义”解读	/许 峰/185
十八大以来海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研究	/周文华/196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兴起的主要动因分析	/马小芳、杜意娜/206
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最新解读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介评	/王爱云/215
国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的历程	/于保帅/226

专家访谈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谈毛泽东思想研究	/梁 怡/239
---------------------	----------

会议综述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前瞻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许 峰/247
---	----------

参考资料

海外中国学研究论著推荐目录	/梁 怡、杜意娜、周文华等/254
主要学者简介(一)	/梁 怡、杜意娜、周文华等/263

后 记	274
-----	-----

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简介	275
-------------------	-----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进程



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回顾与思考

——以对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考察为例

张注洪（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要] 海外中国学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其中，国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历史进程，考察这项研究的发展情况，找出我们工作的成就和不足，是为了面对21世纪的国际局势，更好地迎接海外中国学研究热潮的来临，也为了使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和客观。

[关键词] 学界；海外中国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海外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❶，概略言之，是指由国外学者参与的、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其范围至为广泛。其渊源可溯自汉学，其内涵由原来侧重古代，近世纪以来则侧重近现代。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实际上逐渐成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拟以国内学界关于国外中国学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为例，谈谈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与问题，或可算作对“国外中国学”的一点个案“探索”吧。

一、发展进程

国内学术界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行历史的考察，大概经历了哪些阶段？

在1840年为开端的中国近现代史发展进程中，很早就有了国内学者对中国

❶ 海外即国外，见《辞海》对“海外”的解释：“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周环海，故称中国以外地方为海外。”

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同时也有了国外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并有了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对这段历史研究状况的了解和成果评析的产生。

而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地称得上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了解和成果评析，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此时一度把1840—1919年称为近代，1919—1949年称为现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也普遍地把1840—1949年称为近代，而将1949以后称为现代或当代）。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1949—1966年的初始阶段。此时仅有对个别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如裨治文、柔克义、马士、丹涅特、赖德烈、费正清等人部分著作的翻译和对国外研究近现代史状况的零星介绍和评价。比较重要的国外学者论述汇编有《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而史学信息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部分主要发表在社科院的《史学译丛》、《国外史学动态》等刊物上。这些论述汇编和信息报道很不全面，评论则立足于批判，且多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形式仅在较小范围内流传。

第二时期，1966—1976年的沉寂阶段。“文革”十年期间中国对外联系骤然减少，与海外联系或通信，很容易招致“里通外国”的罪责。尽管个别大型图书馆的外文书刊仍可见到，但很少有学者可能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行评析。仅见北大图书馆所订国外书刊尚较齐全；北大创办的《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及资料》（1973）刊发多篇国外中国学研究动态及资料的文章，如韦慕廷著《中国和怀疑者的眼光》（译文）、《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72年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等，一时颇受同行研究者的重视。

第三时期，1976—1999年的勃兴阶段。“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始有国外中国学译著大量出版。专门的动态译丛和书刊，有中国社科院出版的《国外中国研究》（1977年，共4册）、《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80—1995年，共27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中央党校的《中共党史译丛》。此时开始有了专门论述国外研究中国的专著出版，如《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侯且岸，1995）、《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张注洪、王晓秋，1998）^❶、《英、法、德、澳、加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梁怡，北京联合大学，1998）等；工具书方面则有《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冯燕，1981）、《国外出版中国近现代史书目》（杨诗浩，

^❶ 此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七五”课题：“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由张注洪、王晓秋、徐万民、王美秀、梁怡完成。



1980)、《美国中国学手册》(1995)、《俄苏中国学手册》(1988)、《国外汉学研究丛书》(1998)等陆续面世。

第四时期，2000年新世纪开始至今的发展阶段。此时，对国外研究的关注范围更加扩大，调研内容更加全面，提供信息更加新颖，分析渐趋深入。此时的研究成果综合性的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何培忠，2001)、《国外汉学史》(何寅，2003)、《欧洲中国学》(黄长著等，2004)、《北美中国学》(张海惠，2004)等。专题研究则有《太平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考察》(陈君静，2003)、《美国战后的中国学》(2003)、《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朱政惠，2004)等。凡此大都主要或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内容。应该说，对国外研究的信息了解和成果评析方面，中共党史学科的成绩特别突出，在专著方面有《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2005)^①；论文有《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起每年一篇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翟亚柳、陈鹤、乔君)以及专门述评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改革、党校教育、干部政策以及中国“入世”问题研究的专门述评文章等，不胜枚举。另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十一五”规划等还有多项有关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课题^②已经或者即将完成。至于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会议近年来更是多次召开。

① 此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九五”课题，由梁怡、李向前、马贵凡（特邀）、张会才（特邀）、韩凤琴（特邀）、王爱云、张强、巫云仙、韩秀丽完成。

② 其他有关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项目尚有：①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由张注洪、王晓秋、徐万民、王美秀、梁怡完成的“七五”课题“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成龙主持的国家“十五”课题“海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南京大学尚庆飞主持的国家“十一五”课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研究”；梁怡主持的2011年第三批国家社科后期资助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②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梁怡主持的北京市“十一五”重点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成龙主持的广东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启民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评析”；陕西省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理论形态与逻辑结构研究”；尚庆飞主持的教育部一般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教育部项目“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批评”；成龙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等。③其他来源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除国家级、省部级之外，一些省级党校、高校和研究单位加大了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为高级别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我们大致了解到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的“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现状与现实意义”；南京大学杨丹伟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方法、观点和评价”；西北政法学院杨永康的“国外著名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评析”等。另外，近期韩强还发表了《国外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述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理论学刊》2013年第8期）等文章。